

顏健富◎著

中國文學研究叢書 09

從「身體」到「世界」
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目錄

vii	序言 李歐梵
001	導言
001	一、「概念地圖」的轉變
005	二、晚清「新小說」方案
007	三、從「身體」到「世界」
010	四、各章結構安排
014	五、各篇章出處
015	第一章 「世界」想像：廣覽地球，發現中國
015	一、前言：思考的起點
017	二、晚清文藝圈：「我願共搜索世界之奇境異境」
026	三、「異域」表徵：「話說天下五個大洲」
035	四、範式轉移：「遠遊」敘事
045	五、末日／未來記：以「世界」座標重觀「中國」
056	六、結語

CONTENTS

059	第二章 「冒險」精神：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
059	一、前言：「泥磚匠」的堆砌
064	二、「哥倫布」傳播：從宗教人格到冒險精神
072	三、雜混伎倆：「支那哥倫波」的形塑
080	四、繞行地球：「東亞病夫」的正名
090	五、開荒拓野：「非洲」場景的突破
099	六、結語
105	第三章 「忠義」爭奪：論晚清「水滸傳」的忠義堂與新舊世界
105	一、前言：聚焦「忠義」
107	二、水滸精神：遮蔽與彰顯
113	三、爭奪：忠義難兩全？
121	四、正名：「忠義堂」變軌
128	五、認同：新舊兩個世界
135	六、結語

目 錄

137	——	第四章 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
137	——	一、前言：現實與理想的對照
140	——	二、概念旅行：「烏托邦」的翻譯
147	——	三、敘事展演：「小說」烏托邦
154	——	四、文藝脈絡：烏托邦視野的發生
162	——	五、新小說話語：烏托邦書寫的位置
168	——	六、結語
171	——	第五章 「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
171	——	一、前言：旅生的「癡人說夢記」
173	——	二、「地理大發現」與晚清知識界
178	——	三、「父子」關係：從「仙人島」轉向「鎮仙城」
186	——	四、新地理觀：天下為家／天下無家
191	——	五、如何現代？「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
199	——	六、（反）解放的圖景：烏托邦？反烏托邦？
206	——	七、結語

CONTENTS

209	第六章 「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
209	一、前言：身體／國體觀
212	二、身體時局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221	三、小說診斷學：「回春妙手，救國良醫」
231	四、魂體對比法：「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
242	五、結語
245	第七章 「國民」想像：從晚清到魯迅小說的「新中國」與「鐵屋子」
245	一、前言：「國民」反思
248	二、「國民」奇觀：詞彙的流變
255	三、覺醒與昏睡：從「新中國」到「鐵屋子」
262	四、夢想與噩夢：從「未來」到「過去」
269	五、救贖框架：「國民」的功能論
277	六、結語
281	結語
287	引用書目

導言

一、「概念地圖」的轉變

當傳統「萬國衣冠拜冕旒」、享盡「天朝榮光」的空間想像破滅，「中國」不動的「定位性」被迫延伸與流動，打破「萬邦為首」的穩固位置。時人紛紛反思傳統「天下」觀，提出新知，如魏源《海國圖志》指出「中國」不代表天下中央，「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¹徐繼畲《瀛寰志略》拋棄棋局的空間觀念，改採「地圓」說。²「五大洲說」的傳入，進一步衝擊「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理想像，激發時人極具形象性的「世界」論述，如魏源指出：「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者之曠識」、³梁啟超指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盪、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使將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⁴從「廣覽地球」到「世界人」等證詞，反映「天下觀」到「世界觀」的轉向，已非傳統的「華夷之辨」所能概括的新格局。⁵就張德彝《航海傳奇》、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

1 〔清〕魏源撰，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998），卷74，頁1849。

2 〔清〕徐繼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地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

3 〔清〕魏源撰，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卷76，頁1889。

4 〔清〕任公，〈汗漫錄〉，《清議報》，第3冊，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原卷第35期（1900.2），頁2257（頁1a）。括弧內的頁數乃是原刊頁碼，以下皆同。若是重印本與原刊頁碼同，則不另括弧。

5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第94期（2006.4），頁40-53。

記》、黎庶昌《西洋雜誌》、王韜《漫遊隨錄》等日記、文件或遊記，描繪各國新知與國內外局勢，記載博覽會器物、工商製造、上下議院制度等，掀開「世界」的圖景。

當既有的「中心—邊緣」框架搖搖欲墜，各種涉及政治、科學、文學、教育、社會的觀念譯介、知識傳遞，逐漸浮現。據熊月之統計，從 1843 年上海等東南通商口岸開埠開始，西學即在中國蓬勃傳播，1843 年至 1860 年出版西書有一百零五種，1861 年至 1900 年出版西書有五百五十五種，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教育等）、自然科學（含算學、重學、電學、化學、光學、動植物學等）、應用科學（含工藝、礦務、船政等）與其他（包括遊記、雜著、議論等）。⁶ 若就報刊脈絡而言，自創辦於 1815 年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以降，諸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遐邇貫珍》、《新釋地理備考》、《萬國地理全集》、《地理全志》、《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西國近事彙編》、《萬國史記》、《萬國通鑒》、《泰西新史攬要》、《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等刊物，相繼介紹世界地理景觀。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世變」、「奇變」、「奇局」、「奇境」、「創局」、「大變」、「變局」，⁷ 牽動中國思想文化與概念知識的轉型。梁啟超曾指出「近代」與「中世紀」的差異在於學術革新：「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家新世界」。⁸ 在學術革新的視野中，法律、教育、軍備、科學、武藝、社會、性別、醫學等新概念，衝擊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尤其反映於以「通纂」、「匯通」、「全書」、「大

6 熊月之，〈晚清社會對西學的認知程度〉，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34-35。當中不乏著名譯作，如《化學鑒原》、《化學分原》、《地學淺釋》、《萬國公法》、《西國近事彙編》、《佐治芻言》、《泰西新史攬要》、《文學興國策》、《民約通論》、《天演論》等。

7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頁 383-419。根據王爾敏的研究，1840 至 1902 年之間提出「變局」說法的士大夫不下八十一人。

8 [清]中國之新民，〈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下）〉，《新民叢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第 1 冊，原卷第 2 期（1902.2），頁 18（頁 10）。

辭典」為名的書籍，⁹ 開啟不同於傳統類書的「百科全書」視野。

霍爾（Stuart Hall）《表徵：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透過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符號系統分析概念的轉變：由文化信碼所決定的能指和所指間的關係並非永遠確定，詞所指稱的各種概念（所指）由歷史改變，每一次變動都改變著文化的概念地圖（conceptual map），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引導各種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區別和思考世界，遂成「概念地圖」的轉變。¹⁰「概念」乃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基本單位，反映事物的抽象化思維，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質加以概括。概念作為社會經驗與世界認知的智性範疇，構造了生活世界，是社會意義的載體，承載了經驗事實與價值意義的關聯性。藉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的沉積、附著，也漸而形構出理念型概念（ideal-typical concepts），並進而積澱、呈顯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指導著文化行動。概念的變化和擴大，反映了對世界的知識和認識的轉變與拓展。¹¹ 就近現代中國的處境而言，如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指出：中國人自十九世紀初與西方接觸後發現置身於嶄新的世界，不同於與「天朝」或「華夏中國」的新天地，在認知上需要新世界觀——對新世界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以在新世界中作文化自我的定位。¹²

概念或觀念史研究在西方學術界雖有派別差異，大致上通過語彙內涵和含義

9 如《時務通考》（〔清〕紀盛主人編，上海點石齋，1901）、《分類時務通纂》（〔清〕陳昌紳編，上海文瀾書局，1902）、《萬國政治藝學全書》（〔清〕朱大文、凌賡揚合編，上海鴻文書局，1902）、《編譯普通教育百科全書》（〔清〕范吉迪等編，上海匯文學社，1903）、《新輯增圖時務匯通》（〔清〕李作棟編，上海崇新書局，1903）、《新爾雅》（〔清〕汪榮寶、葉瀾合編，上海明權社，1903）、《博物大詞典》（〔清〕曾樸、徐念慈合編，上海宏文館，1907）、《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清〕黃摩西編，上海國學扶張坤德譯輪社，1911）等。

10 Stuart Hall,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 32.

11 鄭文惠，〈觀念史方法與中國研究〉，收入《東亞的知識交流——關鍵概念詞的再檢討》（京都：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頁 58。

12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 期（1999.4），頁 36。

層次的探討，揭示各種概念的生成變化。¹³ 就近現代中國學術研究而言，學者陸續開拓不同面向的討論，頗能勾勒新名詞、關鍵詞、新概念的作用，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觀念作為意識型態的組成要素，比意識型態更基本」，因而「釐清觀念的起源，才能理解意識型態的形成和演變」。兩人根據「中國近現代思想研究數據庫（1830-1930）」，具體而微地考察「權利」、「個人」、「公理」、「民主」、「社會」、「科學」、「經濟」、「革命」等觀念的挪用、演變與定型過程，揭開「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¹⁴ 黃興濤提出「新名詞」與「新概念」對於中國「思想現代性」的推動作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那種重視邏輯實證的思維方式，那種科學、民主、人權、文明、社會和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觀念價值，那種進化論的思想主張和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才開始得到一種帶有整體性和連動性的認知，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社會性傳播和綜合性實踐」。¹⁵ 無論是「概念地圖」或是「認知地圖」的轉變，都能反映彼時競相湧起的概念思潮。當代學者或是揭開「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或是思索其對中國「思想現代性」的推動之功。¹⁶

13 關於「觀念史研究」在西方有其發展脈絡，大致分為德國、英美和法國派：德國史學界以「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亦即「歷史語義學」(Historische Semantik)著稱；英美史學界尤其是劍橋學派則宣導「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模式，探索原本意義上的文本的語境；法國史學界以「話語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或「概念社會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見長，將話語背後的語言形態或社會背景納入研究範圍。見方維規，〈概念史方法要旨〉，《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3卷，頁3-20。

14 金觀濤、劉青峰，〈導論：為甚麼從思想史轉向觀念史〉，《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5。

15 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129。

16 如〔意〕費德里科·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潘光哲策劃「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題，收入《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頁91-260。

二、晚清「新小說」方案

論者每每援引歷史、地理、教育、政治等材料，卻忽略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小說材料。事實上，每一時代都標誌著使「話語」成為可能的知識框架，當新概念作為帶有整個社會集團的政治、科學、哲學、文學等有機知識的「知識型」進入晚清脈絡時，小說材料必然也捲入或參與其中。晚清小說匯集不同脈絡的複雜話語，反映概念思潮的互撞、融合、交錯，交織出紛然複雜的文學樣態，恰可見社會多維結構所重構的觀念思維對於文學與文本空間的銘刻。

本書的研究範疇主要介於 1902 至 1911 年的「新小說」，乃是各文類革命競相發聲的時刻。1900 年，梁啟超〈汗漫錄〉提倡「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前者鼓吹詩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後者呼籲文章內容輸入「歐西文思」，文筆「流暢銳達」。¹⁷1902 年，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又提出「小說界革命」，指出小說具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議之力」，具有四種基本感化力量——「熏」、「浸」、「刺」、「提」，強調「新小說」乃是「新民／新國／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之前提。¹⁸曾被視為「街談巷語」的小說文體，變為文人志士抒發抱負、維新救國的工具。

雖然，學界對晚清新小說的起點持有不同觀點，¹⁹但是差異不大，大多彰顯

17 [清]任公，〈汗漫錄〉，《清議報》，第 3 冊，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原卷第 35、36 期，頁 2261-2264、2329（頁 3a-4b、4a）。

18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新小說》（上海：上海書店，1980），第 1 冊，原卷第 1 號（1902.11），頁 1。

19 晚清「新小說」的起點有數種說法：一、1895 年：韓南〈新小說前的新小說——傅蘭雅的小說競賽〉、吳淳邦〈新發現的傅蘭雅（John Fryer）徵文小說《夢治三癱小說》〉以 1895 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徵求「時新小說」為起點。此一說法以傅蘭雅於 1895 年 5 月 25 日在《申報》登載「求著時新小說啟」、1895 年 6 月上海《萬國公報》第 77 期的有獎徵文《求著時事小說啟》為依據；二、王立興〈梁啟超的小說理論與「小說界革命」〉以 1896 年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第五·說部書》、1898 年〈譯印政治小說序〉為起點；三、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劉柏喜《晚清的小說理論》、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以 1897 年夏曾佑、嚴復《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作為「小說界革命」的起點；四、歐陽健《晚清小說史》將 1902 年標為晚清新小說的發軔，認為自 1902 年起小說創作已與前期傳統小說的創作風格不同。

「變革求新」的視野。「新小說」之「新」兼具兩種詞性：一屬「改革」的動詞概念；一屬相對「舊小說」的名詞概念。就小說功能而言，「新小說」文體預設龐大的期待視野，從社會政治改革、移風易俗到經國濟世等，最終目標是建立新國家。²⁰ 時人刻意凸顯「新舊」對比：「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²¹ 又參照域外經驗：「歐美小說多係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曠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²² 「西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²³ 凡此種種，皆可見新小說並非被動「回應」時代思潮，卻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介入時代進程，傳播新知。各小說刊物懷著參與國家改造的熱誠，如《月月小說》發刊詞強調「此本之出，或亦開通智識之一，進而助國民於立憲資格乎」、²⁴ 《繡像小說》創刊號強調「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鑑」。²⁵

雖然，作為「新小說」對立面的「舊小說」常被比附為「說部之毒」，寄寓著「汰舊換新」的「進化」思維，可是卻無法遮掩其自身內蘊的文學傳統。陳平原已指出：「當他們聲稱反叛傳統時，分明拖著一條長長的傳統的尾巴；當他

20 1902年是梁啟超發起「小說界革命」的時間點，對於小說技術、內涵產生革命性影響，如陳俊啟指出「任公整體的視界以及這篇文章的最終目標，乃是本諸社會使命感，來教育百姓，達到新民救國，最後建設一個新中國的職志」。見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6），頁336。

21 [清]佚名，〈讀新小說法〉，《新世界小說社報》第6、7期（1907），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299。

22 [清]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清議報》，第4冊，收入《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原卷第68期（1901.1），頁4306（頁1b）。

23 [清]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遊戲世界》第10期（1907），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247。

24 [清]延陵公子，〈月月小說出版祝詞〉，《月月小說》（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第1冊，原卷第1號（1906.11），頁1-2。

25 [清]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繡像小說》第1期（1903.5），無頁碼。

們表示皈依傳統時，分明又現出西方的影響。正是這介於古今與中外之間的特殊處境，決定了這一代作家的創作視野和審美情調。」²⁶文學傳統雖具有或隱或顯的規範力，並非一成不變，反而具有調控與修正的功能，以美國學者希爾斯（Edward Shils）之語便是「傳統的延傳變體鏈」（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²⁷在中西座標衍生的複雜作用力下，作者一旦召喚文學傳統，必因異文化的介入而出現一番拉鋸。各種固有或新起的概念在文學傳統、異文化的拉扯下，折射西學新知、救亡圖存、革命論述、文化傳統等。以此而觀，西潮東漸與文學傳統並非二分，卻在敘事的衍生轉化中磨合頡頏、滲透交融，進而確立起特定的文學意義與時代精神。

就研究方法而言，小說敘事有其虛實交錯的想像，無法直接以歷史或思想界的視角切入，而得重新調整思考：「概念」如何作為一喻體進入語象符碼與敘事結構，進而產生衍生連接、裂變轉化？本書從「文學視角」切入，觀察小說敘事如何接受／置換／剪裁／虛構特定的概念，透過敘事、人物、對白、場景、意象等元素，呈現生動鮮明的概念衍繹？本書有意從小說文體特有的質素，探討各作者如何透過敘事元素如文字排列、意象經營、人物形象、情節塑造等展演概念，接而辨析箇中可能隱含的範式轉變。本文並非觀念史研究般就語詞形態為中心或據若干新名詞相應的觀念群，探討其使用頻度與意義變化，卻是根基於文學研究的視角，探討概念在小說敘事中的展現，以及其對於小說敘事的衝擊。

三、從「身體」到「世界」

本書聚焦於「世界」、「烏托邦」、「身體」、「國民」、「冒險」、「忠義」等視

26 陳平原，〈新小說的誕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9。

27 [美]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17。

角，乃是切合彼時之改革訴求的新興議題。各概念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呼應，小至個人魂魄，大至宇宙世界，實屬不同層次的「疆界空間」，²⁸寄寓著澎湃洶湧的時代思潮，或反思中國現有的桎梏困蹇，或想像未來重振雄風的景象。沓至紛來的時代亂象促使晚清作者發出焦慮、憂傷、憤怒之聲，卻也激勵高亢激昂的救贖之音。²⁹從肉身形體、魂魄精神到國家世界的思考，尤可呼應「新小說」文體的功能期許，展現多位一體的視野：文體／身體／國體，隱藏著一振衰起敝的「理想」視域，反映家國興亡的焦慮與社會改革的期許。

「身體」作為「存活的有機體」(living organism)，也是「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在各文化和歷史階段中呈現不同的概念。近代中國「身體」被置入由族到國或由國到族的認同與主權建構過程，國力建構依賴的是「身體」的存在與其強弱特質，於是開啟各種操控身體的機制。³⁰小說渲染各種身體意象，使得「身體」成為無盡延展的空間，折射羸弱、衰敗、阻礙、陰暗、死亡、落後的印象，反映四分五裂、分崩離析、積弱不振的國體。「國民」與「奴隸」屢屢成為一組對比的概念，在衰頹的時局中，「國民」被塑想成救國救民的「工

28 就理論層面而言，列斐伏維 (Henri Lefebvre) 不再沿用傳統心理／物質、想像／真實的二分法，提出三大層次 (triad)：空間再現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現的空間 (Representation space) 以及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他試圖整合物質、心理、社會三種空間 (a unitary theory of physical, mental, social space)，討論三者的互動關係。空間既不是靜態不變的物質，也不是純粹想像的產物，它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一種不斷製造社會關係的「過程」，是一種「空間是過程」的整合性。縱橫時空座標而形塑的空間擴張與再認識，涉及地理、人際和文本疆界構成的多元「疆界空間」。見〔法〕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著，王志弘譯，〈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頁 19-30。

29 如歐陽健指出：「晚清的最後十年，曾經被描寫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裡，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萌發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理想憧憬。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和富強，是晚清新小說最普遍突出的主題。」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頁 225。

30 黃金麟對「身體」國家化、使命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有詳細的討論，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具」，處處針砭中國民眾的「奴隸」根性，使得眾多論者鼓吹「國民」義務與權利，將中國傳統體制下的「奴隸」轉換成西方概念下的「國民」，如同沈松僑所稱：「『國民』概念最突出的特質，卻是將所包攝的個人尊嚴、平等與權力等西方（特別是英、美）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所賴以存立的諸項核心價值。」³¹「國民」可視為一套「模範」框架，注入自由、自主、權力、義務、文明等價值。

晚清作者將各種看似生理存在的「身體」引入近代崛起的「國體」規訓，從形體、魂魄、筋脈到器官等都可編成「國體」指涉，或凸顯國家遭遇或反映治療期許，共構成「身體／國體」的新視角。1902年，梁啟超倡導屬「公德」之一的「冒險」精神：「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³²梁啟超的登高一呼，迭有迴響，提倡可以「振冒險之精神，助爭存之道力」的著作，³³鼓盪冒險進取、勤奮樂觀、愛國憂族等「救亡圖存」的特質。除倡導西方的冒險精神外，時人亦重新反思中國的傳統倫理，替「忠義」觀注入後起的民主、民權、軍國民、無政府主義、俠義、烏托邦、公理等思潮，重啟「中心」與「邊陲」的秩序。傳統以「朝廷」作為「定位空間」的認同方式遭到挑戰或解構，晚清作者重新繪製「忠義」觀念，在「忠義堂」的空間布局上拓展立憲堂、選舉廳、獨立廳等，反映晚清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變動軌跡。

文藝作者處於一個已非天圓地方的時局，必然對時勢有所回應。早於十九世紀七〇年代，文藝刊物如《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寰宇瑣紀》便出現有別於

31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4期（2002.12），頁687。沈氏提及：「國民身分既指稱一個政治社群的成員，更意味著其所應享有的各項應得的（entitled）平等權利。唯有經由國民意識的涵化，『人民』才得以自消極無為的自存狀態中瞿然覺醒，確立其作為國家政治主體的獨特地位。『從臣民到國民』，因而往往被視為政治現代化必經的發展歷程；『國民』一詞的普及化與常識化，遂亦經常被引為量度『民主過渡』的有效指標。」

32 〔清〕中國之新民，〈新民說五·第七節、論進取冒險〉，《新民叢報》，第1冊，原卷第5期（1902.4），頁8（頁1）。

33 〔清〕佚名，〈商務印書館最新小說四種出版〉廣告，《申報》（1906.3.2），第5版。

傳統「天下觀」的「瀛寰」、「四溟」、「寰宇」等命名方式。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各作者更進一步開啟「世界」櫥窗，介紹各國史地、國際政治、瀛寰人物、西方思潮、海外文藝等，不同程度地鬆動、衝擊、轉變文學傳統的「天下」觀。在新世界觀的傳播中，由英國摩爾（Thomas More）創建的「烏托邦」（Utopia）概念先後被來華傳教士、中國知識分子翻譯，經由中西概念的交錯／混淆／重疊，成為具有反思中國的理想圖像，進而衝擊小說敘事的範式。從地球到月球、從村到城、從新中國到新未來、從鄉鎮到世界、從島嶼到山峰，都出現殊異於傳統仙鄉桃源的理想境地，構築豎立於「世界五大洲」之中心的「新中國」。

從「身體／國體」、「烏托邦」、「世界」等，或自傳統概念上翻陳出新，或吸取西方術語展現新貌，無不反映「概念地圖」的轉向，乃是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愈是知識遽變的時刻，愈能牽動歷史鏈上的文化信碼，使得原本穩定的所指與能指鬆動、斷裂、重組，勾勒知識圖譜的轉型，展現時人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期許。從「身體」到「世界」等不同的疆界空間，均寄寓社會家國議題。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晚清小說，必然也反映概念地圖的轉變，透過小說敘事、人物形象、時空布局等觀察，可見到概念進入語象符碼的衍繹，經由接受、闡釋和再創造，銘刻各種涉及政治、科學、文化、歷史、教育與社會的內涵，反映晚清概念、文學乃至文化之轉型。

四、各章結構安排

本書各章大致圍繞著「世界」、「烏托邦」、「身體／國體」三大主軸。每一主軸設有二至三篇論文，各具宏觀的整體視野與微觀的文本細讀，在俯瞰性的時代語境勾勒特定的文本樣貌，取例各種文本時又在文本間構織線索，試圖形塑縱深的架構。

（一）世界

第一主軸「世界」有三篇論文，各從宏觀與微觀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

界」想像。第一章〈「世界」想像：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整體性視角探及晚清小說界對「世界」思潮（如史地、政治、文化等）的傳播。在「話說天下五個大洲」的架構下，各作者重繪不同於「蠻荒混沌、愚昧落後」、「鬼怪盛行、凶險可怕」的「異域」，使得神祕／鬼魅化的異域書寫轉向一個可由地圖、儀器、制度、科學、政治等繪製測量的新概念地圖，強調宇宙源起、進化論、五大洲劃分、人類分布、各國政治等內容。在祛魅的新「概念地圖」上，晚清作者重構「遠遊」敘事，結合冒險、地理、器物、文學等不同脈絡的元素，調動敘事法則，將傳統飛天遁地的玄幻／神魔飛躍法轉為晚清脈絡的器物飛躍法，從「廣覽地球」、「世界任我行／住」等擴展到「世界外之世界」，開拓文學傳統的「遠遊」範式。「世界」話語提供晚清作者自我對照的視角，以「末日記」與「未來記」的極端敘事場景，將「中國」置入「世界」的座標，重新想像／評估／定位中國的位置。

「新世界觀」衝擊小說文類與內涵，促成「冒險小說」的創作。第二章〈「冒險」精神：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則從微觀視角，分析單一文本《獅子血》的人物——「支那哥倫波」如何在北冰洋、墨西哥、西班牙、爪哇、非洲等「世界」場景中探勘冒險。隨著人物的視角，各大洲的自然景觀、歷史演進、地理分布、文化風俗、人種特徵等逐一呈現。《獅子血》乃是中國較早標上「冒險小說」的創作，替傳統小說注入新氣象。人物身上寄寓著中西思潮與書寫成規，得以避開簡單的「新舊」、「中西」等抗辯架構。就「繞行地球」的架構，可見到人物探向世界時「追奇獵異」的心理，藉由「自我」與「他者」的對照，改寫「東亞病夫」的形象。該小說觸及晚清作者普遍無法掌控的「非洲」場景，以逾半篇幅呈現非洲的部落體制、文化習俗、殖民方案等，勾勒奴隸市場、擄人族、蛇堂膜拜等，堪稱晚清小說最詳細的「非洲」書寫。

第三章〈「忠義」爭奪：論晚清「水滸傳」的忠義堂與新舊世界〉探討新世界觀對於晚清水滸續書的衝擊。在「新小說」的「文藝——政治」秩序中，原有「誨盜」疑義而違背二十世紀公理精神的「水滸精神」重新被編碼，在「遮蔽／彰顯」的閱讀策略中，一百零八條好漢的草莽根性被馴服為理想國民。各種西

潮東漸的政治理念鬆解傳統的倫理觀，使得「忠義」的對象得以改弦換調，「忠義」可「兩全」。各作者又將「起義廳」正名為「忠義堂」，「獨立廳」、「立憲堂」、「選舉廳」等，牽引出政治、文化認同的變動軌跡。在「忠義」觀念的轉調下，原屬山寨性質的「梁山泊」，出現新舊世界的劃分，從「面向朝廷」的「第二社會」轉向「面向世界」的「新中國」，反映近現代知識分子立足世界的焦慮與渴望。

（二）烏托邦

在「揭發伏藏，顯其弊惡」的譴責聲中，晚清文化界掀起另一極端的「希望」之音，形塑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視野。第四章〈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追蹤各報刊材料，鉤隱抉微，回應最基本卻最棘手的問題：「烏托邦」概念如何在晚清文化界、新小說文體乃至文藝刊物中「發生」？從「概念旅行」的角度，追蹤「烏托邦」詞彙的翻譯歷程，包括傳教士及中國知識分子因其不同的位置而注入特定內涵，又結合黃金世界、大同、極樂世界、華胥國等概念，拓展「烏托邦家族」，遙指一可逆轉危機的「新中國」。該文從「書寫主旨」、「時空形式」與「價值內涵」三項目歸納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又透過文類角度勾勒其在文藝場合中的發生，進而指出政治、科學、理想、社會小說等次文類對「烏托邦」視野的拓展與制約。從文學史角度而言，遍布各出版社、報章、期刊與作者群的「烏托邦」書寫，相比起「譴責小說」，更能呼應「新小說」文體的期待視野。

第五章〈「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則從單一文本論證晚清新地理想像與空間概念對傳統「仙人島」的衝擊。晚清「地理大發現」對於空間認知的變革，影響《癡人說夢記》父子角色對理想空間的想像。

「五大洲說」、「國家」等概念衝擊小說敘事：人物逃亡時已能足遍各大洲，以「天下為家」，接而又交織出「天下無家」的敘事，出現虛化的空間——烏托邦。在「老大帝國／少年中國」的架構上，現實中受難的賈父將理想投射到仙人島，卻是南柯一夢，反映父親／傳統／老大帝國的窘況。藉由兒子賈希仙尋訪仙

人島，改寫傳統的空間視野，建立兒子／現代／少年中國的新秩序，儼然成為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在烏托邦方案上，該小說的理想模式卻又隱含各種暴力，賈希仙不自覺複製列強的欺壓手段，反映「烏托邦」一體兩面的「反烏托邦」視野。

(三) 身體／國體

本書第三主軸聚焦於「身體／國體」視角，探討晚清作者透過人物的「身體」形象，渲染各種國體遭遇、時局變化與改革期許。其中，第六章〈「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從俯瞰性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分析「身體／國體」的視角如何在小說敘事中發生？作者透過「身體」的分裂、拉扯、非人化等筆調，描繪近代中國在「進化」話語下的「弱肉強食」，構築一具有視覺意象的「身體時局圖」，反映四分五裂、積弱不振的國體。晚清「新小說」文體預設的「改革」視野，結合各種醫病言說、醫學原理、器物發明等，將「病體中國」推到手術床上接受診斷、治療，開拓嶄新的「醫病」想像，早於五四之前便實踐「文學」治療民族痼疾的敘事。各作者不止於疾病的治療，更進一步以極大化的「對比」架構如「新與舊」、「古與今」、「強與弱」、「睡與醒」，替人物淬魂鍊體，重振國體之威，構成「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的敘事。

第七章〈「國民」想像：從晚清到魯迅小說的「新中國」與「鐵屋子」〉探討晚清崛起的「國民」理念如何衝擊晚清乃至魯迅的小說，反映小說史的演進面貌。該文先從「國民」詞彙的流變切入，凸顯一個「國民」，如何被各作者表述，進而以「覺醒」與「昏睡」、「未來」與「過去」為視角，論證晚清與魯迅的小說在不同的「國民」概念的介入下，構築朝代末與世紀初交錯的「身體」奇書，極端而瑰麗，激切又詭異。「國民」或成為力振山河、雄心壯志的希冀所在，或成為承擔國事日非、社會頹壞的重擔，蔚為小說中鮮明的空間意象：「新中國」與「鐵屋子」。若是聚焦於作者的寫作動機，各自表述的國民卻又相互呼

應，「國民」被放在國家盛衰的角度上，擔負起歷史、政治的責任，在不同的向度展示具有救贖意味的書寫框架。

五、各篇章出處

第一章：〈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1 期（2012.9），頁 1-44。

第二章：〈雜混、獵奇與翻轉——論何迴《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清華中文學報》第 10 期（2013.12），頁 57-116。

第三章：〈論晚清小說對《水滸傳》「忠義」的演繹〉，《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4 期（2012.12），頁 205-239。

第四章：〈「小說」烏托邦——論晚清文學的結構性書寫〉，《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2011.6），頁 117-151。

第五章：〈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2005.11），頁 105-138。

第六章：〈「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9 期（2013.11），頁 83-118。

第七章：〈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2005.6），頁 325-358。